

海疆枢要：明清白鸽寨的区位、军事配套设施与战力分析

张颖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白鸽寨是明清时期雷州府沿海的水师重镇，地处雷州半岛东部沿海，是广东西路海防体系的关键节点，承载防倭、缉盗、护港、会哨等战略职能。分析白鸽门水寨选址的交通、水文和物资条件，对探究白鸽寨周边炮台、烟墩、巡检司等军事配套设施的分布格局与功能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再从兵力配置、战船规模、后勤保障、实战表现等方面，系统剖析白鸽寨的战力水平，探讨其在明清不同时期战力起伏的原因与历史影响，希冀能对明清雷州半岛海防体系的构建与演变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白鸽寨；区位；军事配套设施；战力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575

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面临着倭寇侵扰、海盗劫掠、西方殖民者窥伺等多重海疆威胁，作为海防体系的重要载体，水师水寨的空间选址、配套布局与战力演变，直接折射出王朝海疆治理的地理逻辑与制度效能。雷州半岛地处粤桂琼三省海路交汇之地，是广东西路海防的战略枢纽，而白鸽寨作为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六水寨”的重要构成，自隆庆年间设寨开始，便长期承担雷州府防倭、缉盗、护港、会哨之责，被称为雷州海防的“郡城左臂”，其发展兴废与雷州湾乃至广东西路的海疆安全休戚相关。

一、白鸽门水寨选址的区位分析

白鸽寨的位置充分结合了雷州半岛的地理形胜、海洋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具有鲜明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雷州府海防的核心据点，下面从交通优势、后勤补给和区域联动等角度分析白鸽寨的区位条件。

（一）交通条件

雷州湾是雷州半岛东部沿海的核心海湾，东接南海，西连雷州府腹地，是海上通往雷州府城、遂溪县城的重要门户，也是粤西沿海与琼州海峡、北部湾往来的必经之路。白鸽寨地处雷州湾北侧的通明港，濒临沙头洋，遥对东海岛，可直接监控雷州湾的海上往来船只，其地理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二）水文条件

白鸽寨所在地通明港是雷州半岛东部沿海的天然良港，港湾宽阔，水深适中，且有通明河汇入，可提供充足的淡水补给，便于兵船驻泊、维修与补给。《广东海防汇览》记载：“今六寨之中，水深可泊者：在南头则有屯门、佛堂门也；在柘林则有东山下、河渡门也；在恩阳则有神电、马骝门也。若白鸽门汛地，惟北隘头可以泊船，其港亦浅，兼以巡哨锦囊、永安二所，往来洋中俱有沙，大船恐弗利也。”^[1]此处虽提及白鸽门汛地部分区域水深较浅，不利于大船通行，但通明港作为核心港湾，水深条件足以满足明清时期水师战船的驻泊需求，且沙头洋作为外海锚地，可作为兵船巡逻、会哨的临时驻泊点，形成“内港驻泊、外海巡逻”的布局，兼顾了安全性与机动性。此外，白鸽寨周边有六角大井等水源，可满足官兵的生活用水需求，为白鸽寨的长期驻守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三）物资条件

白鸽寨坐落于调蜜村内，明清时期，随着白鸽寨的建设，调蜜村逐渐发展成为人口聚集的村落。把总统蒙勋任内，“修屋宇、班房、书室，建罗星亭，渡头建问津亭、济川亭、筑埠头，砌石闸以阻海潮，筑菩提桥，重修

作者简介：张颖（2001—），女，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海防地理、历史交通地理。

天妃宫、关帝庙”^[2]，进一步完善了村落的基础设施，使通明村成为白鸽寨官兵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提供粮食、衣物、维修材料等补给。同时，通明村周边有海头、北月、旧县等村落，可作为白鸽寨的外围防御据点，增强了白鸽寨的防御能力。此外，白鸽寨距离遂溪县城、雷州府城较近，便于与陆地营汛协同联动，在遭遇贼寇袭击时，可快速获得陆地兵力的支持。

总之，明清时期白鸽寨扼守雷州半岛南北，淡水资源和补给充足，外围有村落分布。三者共同促成白鸽寨的选址，为建寨驻兵提供坚实基础。

二、白鸽寨周边的军事配套

明清时期，白鸽寨作为雷州府核心水师水寨，并非孤立的军事据点，而是依托雷州半岛的地理格局和历代驻守将士的不断经营，形成以白鸽寨城为核心，涵盖炮台、烟墩、巡检司等设施的军事配套体系。这些配套设施与白鸽寨相互联动、相互支撑，共同承担着防倭、缉盗、护港、会哨等战略职能。

（一）白鸽寨城的历代经营

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兵船主要驻泊于沙头洋，官兵多居住于船上或临时搭建的营房，调蛮村一带人烟稀少，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村落。

万历十四年（1586年），把总童龙任内，在调蛮村“把总童龙创堂门”^[2]，开始修建固定的营署与祭祀设施，白鸽寨的营署布局逐渐形成。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把总续蒙勋携家眷驻守通明，进一步完善营署与村落基础设施，调蛮村逐渐发展成为人口聚集的村落，营署位于村落内部，兵船驻泊于通明港与沙头洋。此前白鸽寨的海防出汛公署早已颓废，导致海防官员遇汛期仅“虚应故事”，后动支官银，在通明港寨内重盖四重公馆，作为专门的防汛驻扎之所，白鸽寨钦总曾之熊负责督修，其全程主持木石采买、工程经办，效率极高，让白鸽寨首次拥有固定、专用的海防实战衙署，结束了“防汛无定署”的现状，完善水师出汛巡海的制度体系。

清初，由于康熙迁界政策，白鸽寨被废，康熙八年（1669年）复设，九年（1670年），“新筑白鸽寨土城，环寨筑城”恢复驻守。康熙十年（1671年），“修复水师哨船，分隶白鸽寨、海安营申严洋禁”，兵船驻泊区域仍为沙头洋与通明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水师参将江起龙驻扎白鸽寨通明港，“捐貲立营寨，招居民屯聚，为墟市，商货毕集，声势与雷城相联络”^[3]，进一步完善了营署与村落建设。嘉庆十五年（1810年），海盗平定后，清廷对雷州海防进行调整，“改原驻白鸽寨的雷州右营移驻东山圩，是为东山营，归高州府碇洲营都司管辖”^[4]，兵力与营署职能有所调整。随着海防形势的变化，白鸽寨的军事地位逐渐下降，但始终驻守于通明港一带，直至清末海防体系瓦解。

（二）军事配套设施的分布格局

白鸽寨周边的军事配套设施主要包括炮台、烟墩、巡检司，各类设施遥相呼应，分布于白鸽寨周边的沿海区域与陆地要冲，形成了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分布格局。

1. 炮台

炮台是白鸽寨周边最核心的防御配套设施，主要分布于通明港周边的港湾要冲与海岛之上，用于扼守港口、抵御贼船进攻，与白鸽寨的水师战船形成“水陆夹击”的防御态势。根据清代文献记载与舆图标注，白鸽寨周边主要有以下几座炮台，“海头炮台一座，周围阔二十七丈，高一丈四尺；北月港台一座，周围阔四丈八尺，高二丈二尺；旧县港台一座，周围阔七丈八尺，高一丈三尺；库竹港台一座，周围阔三十七丈，高二丈四尺。”分布于白鸽寨的东、北、南三个方向，形成环形防御格局。

2. 烟墩

烟墩，又称烽燧，是明清海防体系中的重要预警传递设施，主要分布于沿海高地与交通要冲，用于传递贼寇来袭的预警信息，确保白鸽寨与周边营汛、村落能够及时做好防御准备。白鸽寨周边的烟墩主要有以下五座：北品烟墩，至白鸽寨八里；北家烟墩，至白鸽寨十五里；黎村烟墩，至白鸽寨一十里；芙村烟墩，至白鸽寨三十里；白鸽寨烟墩，至府五十里。以上俱白鸽寨拨兵防守。这些烟墩便于观察海上与陆地的动静，烟墩之间间距合理，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传递，形成了预警信息网络。烟墩可快速传递贼寇来袭的预警信息，为白鸽寨的防御争取时间，是其周边军事配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巡检司

凌禄巡司是白鸽寨周边最核心的巡检司，位于海康县境内，距离白鸽寨不远，《苍梧总督军门志》记载：“（白鸽门寨）一至海康，哨逻围洲一带，与新移泊守龙门、干体港兵船会哨，去凌禄巡司结报即回，不许在彼住泊。”

^[4]凌禄巡司的主要职能是协助白鸽寨的水师进行海上巡逻、缉捕盗寇，同时负责管理海康县沿海的港口与村落，

维护沿海治安,传递军事信息。

湛川司巡检位于遂溪县境内,辖区涵盖遂溪县东部沿海,包括东海、通明、黎村等八社,其中包含白鸽寨市、通明汛等重要节点,《广东通志》记载:“湛川司巡检辖区在县境东部,濒临大海,大致范围为城东南六十至一百五十里,城南一百二十里,城西一百三十里,南界海康,东北隔河与吴川县分界,辖东海、通明、黎村等八社,有东山墟、那简墟、白鸽寨市、通明汛等。”^[1]湛川司巡检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白鸽寨周边的村落与集市,维护陆地治安,缉捕登陆的贼寇,同时协助白鸽寨做好后勤补给与物资调配,保护白鸽寨的陆地补给线。

三、白鸽寨的战力分析

(一) 白鸽寨的兵力配置

嘉庆《雷州府志》载:“白鸽为郡城入海之口,为雷州左臂,无白鸽是无雷矣”,足见其海防地位之重。其兵力配置围绕海防需求展开,明、清两朝因时代背景差异形成不同体系,结合史料,可从官员设置、兵源、兵力规模与分布三方面分析。

明代白鸽寨的官员设置较完善,最高主官为五品“钦依把总”,由朝廷直接任命,掌官兵训练、调度、剿寇等事。万历《雷州府志》详载:“家健四名,每月各支银八钱。书记一名,吹鼓手四名,旗手五名,火药匠一名,各每月支银八钱。火药教师一名,月支银一两二钱”^[2],分工明确,保障寨内运转。清代官制简化,主官初期为正三品参将,后改为正五品守备。顺治十三年(1656),江起龙任水师参将,驻守白鸽寨通明港,通明村有顺治十六年(1659)所立《钦差分守雷州水师江公去思碑》,江公即江起龙,此碑高1.3米,宽0.7米,字体为楷书,碑题字大,较易辨认,但碑文内容因磨损严重较难释读,仔细辨认,尚可释读约略可见“左司把总黎起凤”“右司把总李正□”,有“左司把总覃□□”“右司把总周□”,左营左司把总属官“陈大有”等,另有“兵”若干名,姓名难以辨认,大略可知中军、左营、右营各营的军官设置与人员信息。

白鸽寨兵源具鲜明时代特征,明代以募兵为主、卫所兵为辅,清代以经制兵为核心,均优先选拔“习水战、懂海防”者,确保水师战力。明代洪武元年设雷州卫,洪武二十七年增设“海安、海康、锦囊、乐民”四所,称为“外四所”,史料记载:“拨内外四所旗军七百名,分上下班防守”,但卫所兵不习水战,防御效果不佳。隆庆年间,倭寇攻陷锦囊所,朝廷遂设白鸽水寨,专门招募沿海渔民、船工为募兵,此类人员熟悉海情,是一线作战核心。明代白鸽寨定额官兵九百员名,多数为募兵,分工明确。清代兵源以经制兵为主,朝廷统一招募、编册管理,兵源稳定。其兵额明确,史料记载:“白鸽寨自康熙十一年起,原设水师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战守兵七百三十二名”,后经裁汰调整,“步战兵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岁支饷银三千七百三十七两五钱、米九百七十五石”。康熙十六年,“白鸽寨归正,起设复经制官四员、战守兵六百七十二名”。另有少量家丁、土召兵辅助,通明汛兵分防,部分兵源为前代官兵后裔,承袭水战技能,进一步充实海防力量。

兵力规模方面,明代经历扩充、稳定、缩减三个阶段。嘉靖初领军兵一千四百零五名,《苍梧总督军门志》载吴桂芳奏请:“白鸽门、琼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后经调整,万历年间稳定为九百员名,与战船匹配。清代兵力整体缩减且波动频繁,整体呈“逐步缩减、后期骤降”的趋势,康熙朝因海患缓和小幅裁汰,嘉道年间因朝廷海防重心东移至闽浙、粤东,白鸽寨兵力大幅缩减。康熙十一年原设战守兵七百三十二名,“除屡奉文陆续裁汰外,尚实额官兵六百七十六员名”;康熙二十年“奉文抽拨战守兵二十四名入提标援剿营充额,外尚实额官兵六百五十二员名”;康熙二十三年“奉旨差吏部左侍郎杜、内阁学士石、总督部院吴、巡抚都察院李巡临地方,裁去兵三百二十八名,实留官兵三百二十四员名”;道光年间定额仅三十五名,道光十四年千总张玮率其与海盜激战,活捉头目彭大友等五十余人。

(二) 白鸽寨的战船配置

战船是白鸽寨战力核心支撑,结合《雷州府志》《广东通志》《广东海防汇览》等史料可知,其配置与海防需求、造船技术、财政实力相适应。

白鸽寨海域“港浅多沙、风浪多变”,防御范围涵盖近岸与外洋,战船配置注重“近岸灵活、外洋抗浪”的特点。《广东海防汇览》载:“若白鸽门汛地,惟北隘头可以泊船,其港亦浅,兼以巡哨锦囊、永安二所,往来洋中俱有沙,大船恐弗利也”,故战船多为中小型,适配海情。明代战船类型最丰富,嘉靖初领船五十一只。《苍梧总督军门志》载吴桂芳奏请:“白鸽门、琼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中船共六十只”,万历四十二年定制三十七艘,“三号福江船二只,每只捕兵四十六名,共九十二名;五号槽船五只,每只捕兵三十三名,共一百六十五名;七号槽船九只,每只捕兵二十四、五、六名不等,共二百一十九名;七号哨马船五只,每只捕兵二十四名,共一百二十名;七号艚槽船六只,每只舵兵十九、二十名不等,共一百一十八名;八号尖船九只,每只舵兵十六、七名不等,共一百四十四名;八号桨船一只,舵兵十三名”^[4],分工各异,与北津寨战船协同,构建粤西

海防战船体系。清代战船简化为中小型,明确记载有内河六橹桨船二只、外海双篷艍船一只,适配当时兵力规模与近岸防御需求。康熙九年,千总张玮增筑铁铳,完善战船火器配置。

明代战船数量与型号变化频繁,《雷州府志》有详细记载:

“查得原额战船四十三只,募兵一千四百零五名,岁支银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八两二钱三分。万历十年,裁船六只、捕兵三百名。十三年,议将不堪二号、四号江船七只、楠兵二百五十二名,改造槽船八只,用捕兵二百零八名。十七年,除烧去七号哨船二只、槽船二只、桨船二只、捕兵一百三十八名,将雷廉游帅槽船五只入寨充补。十八年,抽雷廉游帅槽船五只、捕兵一百八十名,白鸽寨七号哨船二只、捕兵五十一名,二项补广海游哨江船一只及濶洲兵船八只。十九年,补造被烧槽船四只、桨船二只,补兵一百三十名。二十年,广海抽五号兵船四只入寨,添守濶洲捕兵一百四十名;本寨又抽槽船二只、捕兵五十二名,拨属北津寨防守限门。二十四年,水寨实大小船三十五只,官兵并火药匠九百员名。四十二年改造尖船二只,共三十七只,兵照原额”。^[2]

万历十年“裁船六只”,这里没有说明原因,结合明代中后期海防财政渐趋枯竭的背景,此次裁船大概率因经费不足或部分战船年久朽腐、无修缮价值所致;万历十三年“将不堪二号、四号江船七只”,“改造槽船八只”,是由于江船不适配海上任务。二号、四号江船,吃水较深、机动性差,难以应对雷州湾浅滩、暗礁密布的海域环境,而槽船是明代近海水师主力船型,吃水浅、转向灵活,适配近岸巡缉、防倭需求。万历十七年“烧去七号哨船二只、槽船二只、桨船二只”,直接损失6只战船;万历十八年抽补兵船,万历二十年,白鸽寨抽兵船到北津寨,灵活调拨战船,避免局部防区因船少兵弱出现防御漏洞。至于兵船型号变动,宋烜研究指出,明代水寨战船从洪武时期的大型海船,逐步向正统、景泰年间中小型快哨船转型以适配实战需要。

康熙十一年原设九只,后“因年久朽腐无存”;康熙十九年“海寇猖獗,奉文各官捐银复造大小战船九只”;康熙二十三年后维持九只左右;中后期简化为三只,乾隆、嘉庆年间维护不善,质量下降,道光十四年千总张玮仅能率两艘战船作战。

(三) 白鸽寨兵力变动频繁的原因

海患松紧是兵力变动最直接原因。明代海患严重,洪武二十七年设卫所防倭,“各造战船,抽调四所旗兵七百名,由各该所官率领,统归卫指挥一员管辖,分为上下两班防守”;隆庆元年,倭寇攻陷锦囊所后设白鸽寨,扩充兵力;万历年间倭寇、海贼、珠盗并存,《海防纂要》载:“万历十七年,珠贼为患,而始有濶洲游击之设”,朝廷多次补兵、调船;明末海患加剧,崇祯五年“海贼刘香入寇雷州东海的白鸽寨”,兵力受损、补充困难,逐步缩减。清代海患缓和,康熙十九年海寇猖獗时补充兵力,“各官捐银复造大小战船九只”;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后缩减,“奉旨裁去兵三百二十八名”;乾隆、嘉庆年间海盗平定,兵力质量下降;道光年间仅存三十五名官兵。

海防政策也是调配兵力的重要因素。嘉靖四十五年吴桂芳奏请设广东六水寨,《请设沿海水寨疏》载:“中路遂溪吴川之间曰白鸽门者,则海艘咽喉之地……各应设立一寨”,白鸽寨随之设立并扩充兵力;万历四年裁革乌兔寨,两广总督凌云翼上疏:“将乌兔寨裁革……自海安所起,至钦州龙门港止,旧有乌兔寨,续已裁革。于白鸽寨委哨官一员,领兵船十只,驻扎海康港防守”,其信地划归白鸽寨,兵力增加;万历十八年添设濶洲游击,兵力调整。康熙二年海禁,“裁并白鸽寨、海安二营,设水师副将一员,中军都司一员,援剿高、雷、廉三府海面,驻扎于海安口”,兵力调整;康熙八年展界,兵力恢复;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裁减兵力;康熙四十三年设硃洲营,“以龙门协所属之干体营兵,令白鸽寨守备、千总、把总统之,驻扎硃洲”^[6],嘉庆十五年“改原驻白鸽寨的雷州右营移驻东山圩,是为东山营,归高州府硃洲营都司管辖”,均导致兵力变动。此外,康熙二十三年裁遂溪营,“官将东汛接连东海沿边一带,悉分白鸽寨拨兵防守台墩”,也推动兵力调整。

白鸽寨港浅多沙的区位海防特点也影响兵力调整。《广东海防汇览》载:“白鸽门汛地,惟北隘头可以泊船,其港亦浅”,决定其兵力与战船配置以中小型为主,兵力部署侧重近岸与港湾。雷州半岛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兵源补充困难,且交通不便,粮饷、船料运输滞后,影响兵力维持。社会动荡也加剧兵力变动,明末战乱、清代农民起义,康熙十四年“高雷廉总兵官祖泽清叛,廉州陷……白鸽寨土官陈大有应之,全雷俱陷,纵兵劫掠居民,沿海村落寨兵屠劫尤惨”,导致兵源流失、兵力损耗;沿海居民迁徙、生计艰难,也影响兵源稳定性,进一步推动兵力频繁调整。

四、结语

白鸽寨是明清广东西路海防核心据点,为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六水寨”重要构成,是明清统治阶级构建沿海防御网络的典型缩影。其选址雷州遂溪通明港,依托雷州湾地理形胜、天然良港与周边后勤补给优势,精准扼守海疆要道,实现南北海防联动,集中体现了明清海防“因地制宜、扼守要冲”的建设思想,成为雷州府

海防的“郡城左臂”。

历经明清经营,白鸽寨形成了寨城为核心,炮台、烟墩、巡检司为配套的海防体系,为守护雷州半岛及北部湾海域海疆安全提供了关键支撑。其战力的兴废与明清海防形势、国家政策、财政状况深度关联。明代募兵为主的兵源结构与适配海情的战船,可灵活应对防倭、缉盗需求,却因后期财政枯竭、贪腐失修战力衰退;清代简化官制、稳定兵源,却因海患缓和裁兵减船,加之海防投入不足,兵力战力大幅下滑,其兵力变动本质是王朝海疆防御需求与治理能力的平衡妥协,折射出传统农业王朝海洋防御理念的局限。作为南海海防体系的重要遗存,白鸽寨印证了明清南海海防变革的实践成效,为明清边疆海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近代以来,传统水寨防御模式难适新的海疆危机,白鸽寨褪去军事职能,但其承载的海疆治理智慧、主权意识,在海洋强国建设当下,仍为当代海疆治理与防御体系建设提供着珍贵的历史参考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 [M]. 王宏斌,校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 [2] 欧阳保.万历雷州府志 [M]//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雷州府志:第 1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 [3] 雷学海,陈昌齐.嘉庆雷州府志 [M]//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雷州府志:第 2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 [4] 应櫟辑;凌云翼,刘尧海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 [M]. 赵克生,李燃,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5.
- [5]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 [M]//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 8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 [6] 蒋良骥.东华录 [M]. 蒋桐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The Strategic Stronghold of Maritime Frontier: Location, Auxiliary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Combat Capacity Analysis of Baige Stockad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Ying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s a vital naval garrison along the coast of Leizhou Prefec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ige Stockade was situated on the eastern littoral of the Leizhou Peninsula and served as a pivotal node in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of western Guangdong, undertaking core strategic missions including resisting Japanese pirates, apprehending coastal bandits, safeguarding harbour security and conducting joint patrols with neighbouring defence units. Clarifying its geographical shifts throughout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layout and functional linkage of its surrounding supporting military facilities, such as artillery emplacements, beacon towers, patrol inspection offices and affiliated water stockades. This paper furth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Baige Stockade from perspectives of troop deployment, warship scale, logistical support and actual combat records,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for its fluctuating combat capability across different reign period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repercuss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s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coastal defence system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Keywords: Baige Stockad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uxiliary Military Installations; Combat Capacity Analysis